



——追念孙晓玲女士

宋曙光

那天晚上的平静被一个微信语音打破了。是张璇在呼叫我，她那一声“宋伯伯……”之后竟是难掩的呜咽：“我妈妈……今天，走了……”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只“啊”了一个字，便不知说些什么；突然、震惊、节哀——串不起完整的语句，骤然间，心情情感沉痛。那是2025年12月30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高大的商厦屋顶上闪烁着彩光，疾驶汽车的鸣笛声划过我的心尖，有阵阵刺感。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就在二十多天前，我还将一篇新作《我与“芸斋小说”》微信传给晓玲，请她收阅并顺致问候。大刚先生代晓玲回复：“谢谢问候。天冷多保重。”

这几年，由于身体原因，晓玲谢绝了所有应酬，对外联络都交付她的先生张大刚，除了有事打电话，平常都是通过微信联系。这样，对晓玲的身体状况，我大致有所了解，知道不会有碍，更不会有生命之虞。怎会想到，她一直叮嘱亲戚朋友保重，自己却没有“保重”，突然间便舍情离去，让亲人突遭不幸。

转天上午，我赶赴殡仪馆吊唁。不论从哪个方面讲，我都要来送晓玲最后一程。回想我们交往的桩桩件件，几十年间纯是文字之交，深情厚谊都浸透在了稿件之中。灵堂的氛围让我眼前出现幻影，那是二十多年前，孙犁先生躺在荷花丛中的面容，哀乐声沉，荷香浓，悲伤之情更加难抑。

得知噩耗的友人们，无不感到惋惜和感伤，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哀悼之情。先看到侯军友的悼诗和悼文，又收到北京卫建民兄的微信。得悉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与孙犁相关的公众号，晓玲去世，大家纷纷悼念，建民兄特别写了一段文字：“晓玲姐多年生病，终于不治，在去年年末走了，我悲伤无语。《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成稿后，我帮着读了一遍原稿，提了一些意见，晓玲姐都接受了。她感觉细腻，驾驭文字的能力比较强，对孙犁老人的工作、生活最熟悉。孙犁晚年的创作，有许多作品就是她帮着抄录的。每年孙犁忌日，《天津日报》的宋曙光先生都约她写一篇回忆文章，以为纪念。她的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回忆文章构成的。因为她的文章，孙犁研究才有了一种可靠

的珍贵史料。晓玲姐爱写作，也喜欢绘画，尤其擅画仕女，假如不是身患疾病，她的才艺还会有所发展。生前，她出了三本书，参与编辑孙犁多部作品集，可说是孙犁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这段话饱含情义，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大约是在2000年年底，或是2001年年初，晓玲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在父亲生前写一些有关父亲的文章。我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若干写作建议，包括题目、内容、篇幅，当时虽不知将写多少篇，但均以《记我的父亲孙犁》为副题形成系列。那个时候，孙犁先生已久卧病榻，再也不能执笔为文，晓玲是在追赶时间，她要完成这个心愿，写出自己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那是在冬季，多少个上午，为了稿子的事，晓玲的每一次电话都是打到我的办公室，说到某些细节之处，晓玲就忍不住地激动，电话那端便传来隐隐的抽泣声，让我的心情瞬间沉重。在她寄来的稿件上，几乎每一页都有泪湿的痕迹，我断定那一定是晓玲的泪水，与我用红笔改动的痕迹相融，该是晚辈对孙犁先生无尽的情思吧。

这组稿件，晓玲需要付出的不仅是精力，还有心血和全部情感。晓玲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也应是从此时算起。2001年2月8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这组系列文章的首篇《战友情——记我的父亲孙犁之一》，晓玲后来跟我说，文章发表的当天，她拿着报纸赶到医院，给父亲朗读她的作品，她想让父亲高兴，作为孙犁的女儿，她的作品也能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外人哪里知道，女儿的付出是何等巨大，从第一篇写到截止的第十七篇，用了将近十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晓玲动了真感情，篇篇落泪，大大损伤了身体，及至以后的多年间，她都不能动笔写作。

二十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回想起晓玲打电话时的情景，在静静的办公室里，那种伤感的气氛挥之不去。那岂止是十几篇稿件，经过泪水的浸透，它们已有了加倍的分量和价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细心的女儿，开始有心地记录父亲的饮食起居，只要在父亲身边，她就注意观察父亲的言谈举止，不放过任何生活

细节。每当有客人来访，她就留心他们的谈话，相互间的交流，甚至是之前的交往经历，这都是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身为女儿的记录者，她记下的文字远比记者的鲜活，比作家的更具亲切感。

在父亲生命垂危之时，晓玲以一种特殊方式尽到了一个女儿应尽的责任，她让父亲生前看到了自己书写的文章，并且是刊发在父亲曾经耕耘过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女儿笔下的父亲，是文学之外的孙犁，是生活之中的孙犁。晓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的这组写父亲的文章，引起了孙犁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当文章刊发至第十七篇时，三联书店便以《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为书名，于2011年6月出版，这是晓玲出版的第一部写父亲的书。

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单篇作品，到集成一部专著，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也是投入最多、倾情最深、耗时最长的一组稿件。所以该书的版权页上，我是特约编辑。晓玲寄来的样书里夹着一张纸条，是该书责任编辑写给我的感激的话。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心香弥久——孙晓玲“记我的父亲孙犁”系列文章编后》，详述了这部书出版背后的故事。这之后，晓玲的写作进入了一个高产期，2013年5月，晓玲又出版了第二部新著《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这应是《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的姊妹篇。2023年9月，她又出版了第三部书《一生荷梦寄清风：我的父亲孙犁》。我在推介这部书的文章《荷香依旧诉亲情——读孙晓玲〈一生荷梦寄清风：我的父亲孙犁〉》中说：“从孙犁作品之外写孙犁，晓玲的书写不可多得，她让读者听到了父亲的话语和笑声，看到了作家同常人一样，也有着悲悯与快乐、脾性和喜好。”

作为父亲，孙犁很高兴晓玲喜欢文学，对她的写作爱好常常热情鼓励。晓玲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父亲教我写文章》，讲述自己学习写作的过程。对于写作上的日渐提高，晓玲特别感恩《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对她多年写作的勉励，在每部书的后记中，她都特别提到我为她的写作，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除了写作，晓玲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孙犁作

品集。我在职期间，凡是找到我的有关孙犁作品的出版事宜，一律都介绍给了晓玲，诸如作品选编及连环画改编，等等。晓玲做的是父业的传承，也是功德之事。那些年，晓玲多次给我寄书，一包一包的，我记得有《孙犁精选集》《青春余梦》《荷花淀》《孙犁诗歌剧本选》《白洋淀纪事》《百年百部中篇正典》《铁木前传（插图本）》……这些编定的书，扉页上有“孙犁”印，她自己的书则是“孙晓玲印”，成为友情加亲情的珍藏。

那些年每年春节前，晓玲都会给我寄赠明信片祝福新春。我知道她的感激之情。除了文字交往，我们平时见面机会不多。印象深刻的有三四次：2001年10月16日下午，来津领取《小说月报》百花奖的铁凝主席，想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我找到晓玲陪同，让铁凝了却了一个心愿，从病房出来，我们三人一起合影留念。2011年秋天，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社联合举办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颁奖典礼，晓玲作为嘉宾与会，就坐在主席台上。还有一次是在天津市东丽杯孙犁散文发奖会上，她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荣获特别奖，她到会领奖。但就是在这样隆重的场合，晓玲都是低调参加，从不发言。

当年在孙犁先生家，好像也很少见到晓玲，我去时都是在工作时间，晓玲则是公休日才在，她要去照看父亲，在生活上尽到一个女儿的义务。而她对父亲的关爱，除去日常生活的悉心照料，还兼有一份敬重和崇拜，她能够发现父亲身上独具的魅力，那是读作品之外的一种感觉，这种善于“发现”，应是源自遗传基因吧。

2023年年底前，我与张璇远赴石家庄河北文学馆，参加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并向孙犁先生塑像献花。回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冬天的银杏树》，刊发在《河北日报·布谷》副刊。我将文章传给晓玲收存。晓玲看过后回复：“这篇文章写得很有诗意，又饱含了对老人的深厚情意。您风尘仆仆、车马劳顿，为孙犁研究尽心尽力，让家属很是感动与感谢。特别是看到张璇给姥爷献花放到他怀里那一段，热泪难忍。我的书摆在展厅父亲照片旁甚为欣慰。”

2024年，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拟出版一套“中国散文60强”丛书，其中孙犁先生的作品需要由家属授权并负责编选。我当即想到了晓玲，以她对于父亲作品的熟悉与解读，是完全能够胜任此项编纂工作的。晓玲代表家人接受了请求，并倾全家之力，极为圆满地编出了一部孙犁散文新集《耕堂犁歌》，我看到样书后，写了《血脉亲缘恩情长——为孙犁散文选〈耕堂犁歌〉而写》的读后文章。这是晓玲最后一次参与编选父亲的作品集，是为绝笔。

前几天，我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海河情缘》，写到了孙犁先生的早期作品《小刘庄》，若在以往，我都要传电子稿给晓玲，请她查阅，现在她是再也收不到了。孙犁先生最小的女儿却是最先离世了，任何表达都难化悲痛，为生者留下绵绵遗念。记得晓玲写过一篇散文《摇曳秋风遗念长》，曾荣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金奖。不妨将题目借用过来，作为我这篇悼文的题目吧。

“树和雪色望难分，未到盘山意已欣……”这首七言律诗《望盘山雪色》的作者是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写于乾隆十年（1745）二月驻蹕盘山行宫期间。全诗通过描绘盘山雪景奇观，抒发了对自然造化的赞叹。每当我欣赏自己收藏的几十枚盘山和蓟州题材的徽章，便联想到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盘山，他曾经作诗千余首吟咏这座名山。

位于天津北部蓟州区的盘山，拥有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盘山曾吸引了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辽太宗耶律德光、辽圣宗耶律隆绪、金世宗完颜雍等历代帝王到这里巡游、礼佛。清代，盘山成为皇家从京城去往东陵祭祖的重要通道。尤其是乾隆帝，一生中共32次登临盘山，最多时一年三次登临，历史上著名的文臣武将如李靖、戚继光、刘墉、纪晓岚等，文人墨客如陈寿、酆道元、高适、陈子昂、汤显祖、徐霞客、孔尚任、洪升等，也纷纷登临盘山，留下很多佳话。津门十景之一的“三盘暮雨”，即为国家AAAAA级景区盘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观。

改革开放后，盘山旅游事业发展迅速，发行了很多旅游纪念品，包括金属、塑料等材质的纪念章。在这些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二）

## 未到盘山意已欣

罗丹



纪念章上，除有“盘山留念”字样外，还有盘山多处名胜古迹的图案。其中天成寺景观出现在盘山纪念章上较多。天成寺是下盘重要的景点，寺内主要建筑江山一览阁的样式便被铸在一枚金属纪念章上。传说乾隆皇帝游至盘山，站在此阁之上，打开窗户，美景顿入眼帘，江山一览无余，他便亲笔题额“江山一览”。此外，还有多种金属纪念章以天成寺舍利塔作为主要图案。该塔为八角密檐十三层建筑，每个檐角悬挂铜铎，风吹声响悦耳。塔基以花岗岩须弥座和三层砖雕仰莲组成，塔身通体呈浅黄色。该塔高22米，游客无不印象深刻。

蓟州区被称为天津市的“后花园”，除盘山风景区外，还有黄崖关长城、翠屏湖旅游度假区、渔阳城古建筑、中上元古界标准地层剖面 and 八仙山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旅游景区。其中，在渔阳城古文化旅游景区内，坐落着享誉中外的独乐寺。

独乐寺，又称大佛寺，其始建时间无明确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在隋唐期间。寺内现存主要建筑为山门和观音阁，皆为辽圣宗统和二年（984）重建。因此它与辽宁锦州的奉国寺、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并称为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称赞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独乐寺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近些年独乐寺附近开设了专门的文创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过，很多收藏爱好者还是更为追捧四十多年前发行的那些传统味道的徽章。如一枚1984年10月发行的铸有“独乐寺重建千年纪念”中、英文字样的圆形铜章，一面图案为独乐寺主建筑观音阁外观，另一面图案为观音阁内的观音菩萨塑像，图案清晰，铸造精良。独乐寺观音阁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外观二层，实为三层，使用了二十多种不同的斗拱榫接，历经多次地震而不倒。阁顶的斗八藻井，为国内现存最早的木构藻井。阁内的辽代十一面观音菩萨塑像高达16米，是国内现存最高的彩塑站像，令人叹为观止。

蓟州北部群山连绵、地势险峻，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明代隆庆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主持重修了蓟镇长城，完善了军事防御体系。位于峻岭之巅的黄崖关是蓟镇长城的重要关隘，其东侧山崖岩石多为黄褐色，在夕阳映照下金光灿烂，有“晚照黄崖”之誉，“黄崖关”因此得名。作为“津门十景”之一，黄崖关长城成为蓟州区较早开放的热门景区。我存有多种黄崖关旅游纪念章，这些金属纪念章从设计风格到铸造工艺等都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时代特色，颇具收藏与欣赏价值。

题图为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盘山旅游纪念章。

## 满庭芳

第五四二七期



## 吴船遥远

王太生

水间。吴船在古诗文里，具有优美的意象：三两艘，首尾相衔，横陈在江南的河汉、水港之中……或者，四围春水荡漾，慢摇轻移，犁一道水痕，两岸桃花缤纷。这时候，或许还会有一个书生站立在船头，朝岸上挥手再挥手，这可能多与爱情有关。或者是，旅人临行分别，人在岸上，身后已有一张帆缓慢地升起，等待起航。

吴船轻盈。春秋时，一种形如刀刀的小船——吴舸，船体两头尖翘，如雨燕，穿梭于江南河道。吴舸线条流畅，是一种切合水网地带实际需求的小船，船行时会飞快地在水道上“剪出”一条水痕。

其实，溯流而上的吴船，一千多年前就泊在锦官城的万柳桥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遥想当年，杜甫来到成都，在不远处的浣花溪畔建茅屋草堂。乍暖还寒的时节，诗人坐在草堂，即可以看到门外帆樯林立，停泊了不少吴船，便有了这诗和远方。

“落日寒江上，吴舟挂短篷。荻花连岸白，烛影傍人红。”夕阳洒落在寒冷的江面，有一条小小吴船挂起了短短的篷帆，岸边荻花连成白色一片，红烛光勾勒出幢幢人影的轮廓。吴歌轻（石城晚泊）呈现出一幅温煦、宁静的晚泊图景。

现代作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记述了当年苏州乡村的运粮船，“万盛米行的河滩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那敞口船，是吴船，装载了一船新米。

太湖渔船（桅船），原名罟船。清《太湖备考》云：“太湖渔船大小不等……其最大者曰罟船，亦名六桅船。”“其船形身長八丈四五尺，面梁闊一丈五六尺，落艙深丈许。中立三大桅，五丈高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桅一，三丈许；梢桅二，各二丈许。”

我静静地观赏过那拉升风帆、静泊于水面的太湖桅船。它总是停泊在远离岸边的湖心深处，估计是太湖水浅，大船不宜泊在近岸的地方，如果是要卸渔货，顶多也是一叶小舟靠上去，把新鲜的“太湖三白”卸下来，运到岸上。犹记得那年，我在无锡甬头渚隔着浩渺水面，远远观望那与天空白云一道静止于太湖水中的桅船。现在看来，湖上船是适宜遥看的，这样一种方式，有距离感、空间感、画面感、年代感……多维度的太湖桅船，在这烟波浩渺的水面，是缓缓移动的水墨风景。

航行中的船，风是动力，思想是帆，在云水之间飘浮、穿越，眼前是光影交错的迷离前途。在美丽的江南河流上，总会有一个从古镇搭船而行的青年，他要去远方，坐这种停靠许多码头的班船。船穿过一座座石拱桥，河埠岸上，粉墙黛瓦。或者，是另一个地方的人，为了看风景，挟一把油纸伞，来到这丝绢般柔软的吴地。

我出生于吴头楚尾之地，所见多是吴船。少年时，常在小城的船间看船。那些船是开往江南的，沿一条古老的官河，进入扬子江，留下一片孤帆远影。在流经城市河流上，驶过的每一条船，都随风飘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船的到来，船头溅出清冽的水花，很像一部电影开头的样子。有时候，船上还有一只摇着尾巴的小黄狗。船突然地行远了，船尾漾起静静的水波，似留下一个让人回味的“结尾”，让人遐想，每一条船，都带走一个故事。

回想我的吴船之旅，那还是许多年前，从无锡去杭州，傍晚时从梁溪码头出发，进入太湖，所见的是碧清的水、远处湖面上露出的干石，以及三三两两的渔船。船在夜色中航行，穿越这一大片浩荡的水，子夜时过湖州，转入京杭运河，天明时抵达杭州。那个夜晚，在太湖湖上，不想竟遇到几个与张岱《夜航船》中情形相似的僧人，只不过他们不是躺着的“缩脚僧”，而是坐着的，从苏北转道而来，往杭州灵隐寺去。那夜，船舱轻柔的吴语中，夹杂着几句不紧不慢的江淮官话，几位僧人表情平淡，面色从容。

河流有河流的秘密。作家苏童在一篇文章里说，河流的秘密在它内心，只是不为人说。水载船，因势赋形；风鼓帆，借力而行，就像古人假某种智慧，思想到达未曾到达的地方，船随水流一行千里。

冷动力时代，双臂划桨，手撑纤背。船在一种节奏中缓慢航行，两个人站在各自的甲板上，相互挥手，身影已渐渐浓缩成一粒小黑点。

真的想到古代，坐一次吴舸，载着七月的瓜果或九月的菊花，在江南的河流上划行。

“大人望插田，小孩盼过年。”这句老话像一粒饱满的炒花生，在记忆里越嚼越香。

腊月的湖北乡下，寒风裹着蜡梅的暗香穿村而过，我刚跨进老家的木门，就被灶房里飘出的焦酥醇香勾住了脚步——土灶台的柴火噼啪燃着，暖融融的烟火气裹着炒货的香，丝丝缕缕漫出来，母亲正站在灶台前，摆弄着河沙、沙铲、篾筛和簸箕，一场热热闹闹的炒年货“大戏”正要开场。

土灶台的火苗舔着铁锅，干柴燃出的烟火气绕着锅沿轻飘，母亲把洗净晒干的河沙倒进锅里，翻炒片刻，待沙子吸足了柴火的温度变得滚烫，便抓一把花生撒进去。花生与热沙相拥，散发出醇厚焦香，混着花生本身的油润脂香，往人鼻子里钻。母亲握着沙铲不停搅动，花生在锅里翻滚，香气便愈发浓郁，从灶房飘出去，绕着屋梁打个转，又漫进院子里，惹得院角的土鸡频频探头。

炒南瓜子最是考验人的耐心。南瓜子皮薄肉嫩，火大了会焦糊，火小了又半生不熟。母亲把灶火调得温温的，沙铲轻轻翻动，瓜子在热沙里慢慢舒展。南瓜子的清香一点点被唤醒，淡淡的果仁香混着微焦的草木气，清润绵长，在鼻尖绕着不散。炒得正合适时，那股清甜便越醇厚，淡淡的烟火气沁进瓜子薄皮里。

炒玉米时最是热闹。玉米粒进热沙里，起初还乖乖地待着，没过多久就“噼里啪啦”地炸开了锅。胀得饱满的玉米粒蹦跳着撞到锅沿，弹到地上，我赶紧弯腰去捡，刚碰到就烫得直摆手，却还是忍不住塞进嘴里，甜香混着焦

香在舌尖蔓延。母亲见了就笑，手里的沙铲一刻不停。她把炒好的玉米粒倒进簸箕里，扬起手臂筛掉沙子，爆米花在阳光下好像闪着光。我装满满一大碗，给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尝一尝。大家你推我搡，嘴里的香、脸上的笑，混着风儿，飘在乡间，让年底的日子变得暖融融的。

炒葵花子是重头戏。家中来了客人，首先摆上桌的就是大盘炒葵花子。母亲一般会炒两种口味。原味瓜子，只放少许粗盐与瓜子同炒，火候拿捏得极准，炒出来的瓜子壳脆仁香，带着阳光晒过的本真滋味，噙着阳光晒过的本真滋味，噙起来满口都是质朴的香。炒五香葵花子时，她取来八角、桂皮泡出香汁，淋入瓜子焖干水分，撒盐后小火不停翻炒，五香慢慢渗进壳里，瓜子噙起来唇齿留香。

蚕豆、豌豆要炒得外壳起皱、裂开才够味儿，咬开的瞬间，浓郁的豆香混着淡淡的烟火气便在嘴里爆开，越嚼越有回甘；炒米则要在沙子里滚得通体金黄，散着淡淡的米香，咬起来嘎嘣脆。母亲边炒边说：“这炒年货啊，就是纳新接福，炒得越香，来年日子越顺。”满满一屋的炒货香，混着柴草的烟火气，混着母亲的唠叨声、柴火的噼啪声，还有我和伙伴们的笑声，酿成了最浓、最暖的年味了。

如今日子好了，超市里的炒货琳琅满目，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总觉得差了几分滋味。我抓起一把母亲现炒的年货，指尖温热，香气绕鼻，心里温暖。这一锅烟火，炒的是岁月，是亲情，是灶火里藏着的团圆与期盼。

## 古人的小年



刘晓丹

在中国人眼里，旧历的年底才最像年底。腊月的日子，是一寸一寸数着过的。到小年这天，空气里便陡然有了浓郁的年味儿。这节日，就像是新春这场盛大乐曲由精心调好的前奏，不张扬，却处处透着郑重。

关于过小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腊明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了这个节日。小年之节庆，北方多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则常是腊月二十四，正如南宋文天祥在《小年》一诗

中写“燕明逢穷腊，江南拜小年。”这短短十个字，不仅是一缕淡淡的羁旅乡愁，更在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一份关于节俭时空差异的珍贵笺注。千年前的那个日子，古人是如何度过的？那些湮没在时光尘埃里的寻常景象，或许我们能从诗人们的作品里窥得一二。

小年的核心，绕不开“祭灶”。这是中国人极富人情味儿的与神祇的互动。灶王，“一家之主”，监督着一年里人们的功过是非，今夜要上天庭汇报。人们对他是敬畏，也是讨巧。南宋范成大的《祭灶词》鲜活地记录了当年人们过小年的情景：“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开篇点明古俗。接着写，“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祭品丰盛，诚意十足。“男儿酌献女儿戏，酹酒烧钱灶君喜。”彼时江南地区仪式多由家中男子主持，女子需回避。又写，“婢子斗争君莫问，猫犬触秽君莫嗔”，那是人们带着谦卑的叮嘱与恳求，盼灶君“上天言好事”，那庄重的仪式与烟火气，如画卷般跃然纸上。

北宋吕蒙正《祭灶诗》，则呈现出另一番况味：“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这位曾历贫寒的宰相，祭品未免有些素淡，但心意却同样虔

敬。一碗清汤，几行诗句，人间清味与精神高洁，一同奉与神明，让这别样的祭灶超脱于世俗功利之外。小年又称“扫尘日”，“尘”与“陈”谐音，洒扫庭院，象征着将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外，以待万象更新。可以想见那时的情景：主妇们裹上头帕，男人们系紧长衫，用新扎制的笤把，拂去屋内一年的积尘。窗棂明净，几案生辉，器物在清扫后泛着湿润的光，以迎接崭新、红火的日子。

打扫停当，人情的热络便“涌”了上来。邻里亲朋，平日各自奔忙，此时借着年节由头，走动也勤了。小年的团聚，更松弛、随意，在严寒中带来一份随性的暖意。或许只是其增添些新腊的豆腐、新蒸的糕团，说说家常，年的序幕，便在这一点一滴的人情往来中，缓缓拉开了。

在这里，诗就像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封封密函。当今天的我们读起它们，仿佛能看见烛火映照下，一张张虔敬又期盼的脸，耳畔也似乎响起了穿越时空、模糊而真切的笑声笑语。这些诗句，如一枚枚定格的镜头，为我们连缀出一卷古人过小年的风情画；有对神明的虔诚与“贿赂”，有对家国的除旧与布新，更有那人情交织的、暖融融的生气，也让我们在循环的时序里，寻得精神的原点与情感的共鸣。